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大戴禮記今註今譯

高明
註譯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大戴禮記今註今譯

高明註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版

大戴禮記今註今譯 一冊

定價新臺幣一百三十二元正

註譯者 高明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

古籍今註今譯，由余歷經嘗試，認爲有其必要，特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伊始，研議工作計劃時，余鄭重建議，幸承採納，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此一項目，並交由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辦。茲當會中主編之古籍第一種出版有日，特舉述其要旨。

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在今日頗多不可解。以故，讀古書者，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在距今四十餘年前，曾爲商務印書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該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五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

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註釋；古籍異釋紛如，卽采其較長者。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然而此一叢書，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猶之嘗其一櫛，而未窺全豹。及民國五十三年，余謝政後重主該館，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甫出版三冊，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商之於余，以其係就全書詳註，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遂予接受；甫歲餘，而全書十有五冊，千餘萬言，已全部問世矣。

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義晦澀，今註以外，能有今譯，則相互爲用；今註可明個別意義，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寧非更進一步歟？

幾經考慮，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爲商務印書館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暫定十種，如左。

(一)詩經、(二)尚書、(三)周易、(四)周禮、(五)禮記、(六)春秋左氏傳、(七)大學、(八)中庸、(九)論語、(十)孟子。

二、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地名必註今名，年份兼註公元；衣冠文物莫不詳釋，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

三、全書白文約五十萬言，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為一百五十餘萬言。

四、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分別定期於半年內繳清全稿。

五、各書除付稿費外，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所有超出之部數，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以上經部要籍雖經一一約定專家執筆，惟蹉跎數年，已交稿者僅五種，已出版者僅四種，而每種字數均超過原計劃，有至數倍者，足見所聘專家無不敬恭將事，求備求全，以致遲遲殺青。嗣又加入老子莊子二書，其範圍超出經籍以外，遂易稱古籍今註今譯，老子一種亦經出版。

至於文復會之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根據工作計劃，更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經史子無不在內，除商務書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餘則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深盼羣起共鳴，一集告成，二集繼之，則於復興中華文化，定有相

當貢獻。

惟是洽商結果，共鳴者鮮。文復會谷秘書長岐山先生對此工作極爲重視，特就會中所籌少數經費，撥出數十萬元，並得國立編譯館劉館長泛池先生贊助，允任稿費之一部分，統由該委員會分約專家，就此三十種古籍中，除商務書館已任十二種外，一一得人擔任，計由文復會與國譯館共同負擔者十有七種，由國譯館獨任者一種。於是第一期之三十種古籍，莫不有人負責矣。嗣又經文復會決定，委由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唯盼執筆諸先生於講學研究之餘，儘先撰述，俾一二年內，全部三十種得以陸續出版，則造福於讀書界者誠不淺矣。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文復會副會長兼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雲五謹識

「古籍今註今譯」序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百年誕辰，中山樓落成。蔣總統發表紀念文，倡導復興中華文化，全國景從。孫科、王雲五、孔德成、于斌諸先生等一千五百人建議，發起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冀使中華文化復興並發揚光大。於是，海內外一致響應。復由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共同策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於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恭推 蔣總統任會長，並請孫科、王雲五、陳立夫三先生任副會長，本人擔任秘書長。

文化的內涵極為廣泛，中華文化復興的工作，絕不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一個機構的努力可以達成的，而是要各機關社團暨海內外每一個國民盡其全力來推動。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整個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負有策劃、協調、鼓勵與倡導的任務。四年多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本着此項原則，在默默中做了許多工作，然而却很少對外宣傳，因為我們所期望的，不是個人的事功，而是中華文化的光輝日益燦爛，普遍地照耀於全世界。

學術是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我國古代的學術名著很多，這些學術名著，蘊藏着中國人智慧與理想的精華，象徵着中華文化的精深與博大，也給予今日的中國人以榮譽和自信心。要復興中華文化，就應該讓今日的中國人能讀到而且讀懂這些學術名著，因此，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其推行計劃中，即列有「發動出版家編印今註今譯之古籍」一項，並曾請各出版機構對歷代學術名著，作有計劃的整

理註譯。但由於此項工作浩大艱巨，一般出版界因限於人力、財力，難肩此重任，王雲五先生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並兼任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乃以臺灣商務印書館率先倡導，將尚書、詩經、周易等十二種古籍加以今註今譯。（稿費及印刷費用全由商務印書館自行負擔。）然而，歷代學術名著值得令人閱讀者實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遂再與國立編譯館洽商，共同約請學者專家從事更多種古籍的今註今譯，所需經費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共同負責籌措，承蒙國立編譯館慨允合作，經決定將大戴禮記、公羊、穀梁等十七種古籍，請學者專家進行註譯，國立編譯館並另負責註譯「說文解字」一種。於是前後計劃着手今註今譯的古籍，得達到三十種之多，並已分別約定註譯者。其書目為：

古籍名稱	註譯者	主編者
尚書	屈萬里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詩經	馬持盈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周易	南懷瑾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周禮	林尹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禮記	王夢鷗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春秋左氏傳	李宗侗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大學	楊亮功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庸	楊亮功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論語	毛子水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孟子	史次耘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老子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莊子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大戴禮記	高明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政審委員會
公羊傳	李宗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政審委員會
穀梁傳	李宗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政審委員會

韓詩外傳	孝經	國語	戰國策	列女傳	新序	說苑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管子
賴炎元	黃得時	張以仁	程發軔	張敬	盧元駿	盧元駿	李漁叔	熊公哲	陳啓天	李勉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國立華文編譯館復興中華運動叢書推行委員會

淮南子	于大成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孫子	魏汝霖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論衡	阮廷焯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說文解字	趙友培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以上三十種今註今譯古籍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肩負出版發行責任。當然，中國歷代學術名著，有待今註今譯者仍多。只是限於財力，一時難以立即進行，希望在這三十種完成後，再繼續選擇其他古籍名著加以註譯。

古籍今註今譯的目的，在使國人對艱深難解的古籍能够易讀易懂，因此，註譯均用淺近的語體文，希望國人能藉今註今譯的古籍，而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與文化，有正確與深刻的瞭解。

或許有人認為選擇古籍予以註譯，不過是保存固有文化，對其實用價值存有懷疑。但我們認為中華文化復興並非復古復舊，而在創新。任何「新」的思想（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無不緣於「舊」的思想蛻變演進而來。所謂「溫故而知新」，不僅歷史學者要讀歷史文獻，化學家豈能不讀化學史與前人化學文獻？生物學家豈能不讀生物學史與前人生物學文獻？文學家豈能不讀文學史與古典文獻？讀史與讀前人的著作，正是吸取前人文化所遺留的經驗、智慧與思想，如能藉今註今譯的古籍，讓國人對固

有文化有充分而正確的瞭解，增加對固有文化的信心，進而對固有文化注入新的精神，使中華文化成爲世界上最受人仰慕的一種文化，那麼，中華文化的復興便可拭目而待，而倡導文化復興運動的目的也就達成了。所以，我們認爲選擇古籍予以今註今譯的工作對復興中華文化而言是正確而有深遠意義的。

今註今譯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們所約請的註譯者都是學識豐富而且對其所註譯之書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們從事註譯工作的態度也都相當嚴謹，有時爲一字一句之考證、勘誤，參閱與該註譯之古籍有關書典達數十種之多者。其對中華文化負責之精神如此。我們真無限地感謝擔任註譯工作的先生們，爲復興文化所作的貢獻。同時我們也感謝王雲五先生的鼎力支持，使這項艱巨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屬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對於這項工作的策劃、協調、聯繫所竭盡之心力，在整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過程中，也必將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

谷鳳翔序於臺北市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十日

自序

宋代的史繩祖學齋佔畢說，大戴禮記曾經列在「十四經」裏，朱彝尊經義考根據他的話，認定宋時曾將大戴禮記列在「經」中，也就把它當「經」看待。四庫提要以為史繩祖的說法沒有佐證，不足採信，只把大戴禮記附在禮記（即小戴所輯，現在存於十三經裏的）的後面，不過是「以類相從」而已。王引之撰經義述聞，仍從朱彝尊的舊例，將大戴禮記看成是「經」，列在禮記的前面。其實，大戴禮記是「經」與否，這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書的本身，有沒有研究的價值。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爲主流，而儒家的思想是以孔子爲宗師的。孔子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些偉大人物的傳統思想，而集其大成的。但是孔子所生的時代，卻是一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孟子語）的時代；我們也可以說，是一個諸子百家因應時勢，紛紛競鳴的時代。孔子在那個時代，栖栖皇皇，奔走天下，並沒有能夠大行其道。何以他的思想經過戰國的動亂紛擾，秦代的暴虐統治，卻反能從諸子百家裏脫穎而出，而成爲中國文化的主流？這固然是由於他的思想裏蘊藏着不朽的真理，而他的七十二高足弟子、三千門人、以及再傳三傳以後的那些儒者，繼續不斷的把他的思想發揚光大，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最可惜的是那些儒者的著述，除了孟子、荀子還有比較完整的書流傳外，其餘的竟都亡逸了！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儒家著述，有五十三種，八百三十六篇之多，現在尚存的，包括孟子、荀子以及一些漢儒的著述，也不過是十中的一二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追尋孔子以後、漢代以前的儒家思想發展的全貌，那是一件何等

艱難的事！幸而還有漢代禮家戴德和戴聖遺留下來的書，彙集鈔錄了許多漢代以前儒者的著述，可以讓我們對這一段儒家思想的發展，找到了一些蹤跡，這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貢獻，不能說是不大。戴德的書，有八十五篇，世稱「大戴禮記」；戴聖的書，有四十九篇，世稱「小戴禮記」，或逕稱為「禮記」。這兩部書性質相同，本來是無可軒輊的。後來馬融、盧植、鄭玄相繼給「小戴禮記」作註，「小戴禮記」與周禮、儀禮並稱為「三禮」，收在「經」書裏，而晉代的陳邵又說「小戴禮記」係刪「大戴禮記」而成（見周禮論序），隋書經籍志也支持這個說法，就給人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大戴禮記」裏的菁華都收在「小戴禮記」裏了，賸下來的都是糟粕，不值得去研究。於是「大戴禮記」逐漸的被人遺忘，也逐漸的歸於散佚，到了現在，就只賸下四十篇了。其實，戴德、戴聖各據漢以前儒者的著述，鈔撮成書，由於他們的眼光不同，選擇也就不能無異；雖然他們也有一些相同的篇章（如大戴的曾子大孝與小戴的祭義、大戴的禮察與小戴的經解、大戴的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的哀公問、大戴的朝事與小戴的聘義、大戴的本命與小戴的喪服四制，內容大體相同），但大多數是不同的，我們如何能說「小戴禮記」是刪自「大戴禮記」？也許有人懷疑，「大戴禮記」亡佚的篇章，就是「小戴禮記」所刪取的；即如漢書儒林傳服虔注曾引大戴曲禮篇、詩標有梅和七月的疏曾引大戴文王世子篇、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所引五經異義文中有「大戴禮器云」句，而曲禮、文王世子、禮器也都是「小戴禮記」的篇名，就可以為證。但是這證據並不十分有力，因為「大戴禮記」亡佚的篇章，也有許多不是「小戴禮記」裏面所具有的；即如曲禮正義引大戴禮王度記，詩汾沮洳正義引大戴辨名記，詩靈臺正義引大戴政穆篇，北堂書鈔卷九十三引大戴禮諡法，唐六典卷十四也說「舊有大戴禮諡法」，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太廟禮一條，賈疏說這條是出於大戴禮，像王度

記、辨名記、政穆篇、諡法、禘太廟禮這些篇章，就都是「小戴禮記」裏所沒有的，我們如何能說「大戴禮記」亡佚的篇章，就是「小戴禮記」所刪取的呢？何況漢魏儒者就從來沒有說過小戴刪取「大戴禮記」的話！鄭玄是漢末的禮學大師，他只說過：「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見禮記大題下引鄭玄六藝論）如果小戴是刪取大戴的書，爲甚麼漢書不說，鄭玄也不說呢？可知這是陳邵以來的妄說，是不足憑信的。現存的「大戴禮記」四十篇，既不是小戴的刪除，更不是殘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禮記」一樣的，保存了許多漢以前儒家思想發展的史料，是十分寶貴的，是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

「大戴禮記」的原本，是八十五篇，鄭玄的六藝論說得很明白，陳邵的周禮論序、隋書經籍志、徐堅的初學記也都這樣說，可見這是大家公認的。可是隋、唐志所載的，只有十三卷，據史記索隱說：「四十七篇亡，見存者有三十八篇。」顯然的，到了隋、唐時代，「大戴禮記」已殘闕不全，只賸下十三卷，三十八篇了。北宋慶曆中所編的崇文總目，載有兩本，「本是十卷、三十五篇，另一本是三十三篇，較之隋、唐時代，更見殘闕。南宋淳熙四年所編的中興書目，載有十三卷、四十篇本，反較崇文總目的兩本篇卷爲多。淳熙二年，潁川韓元吉在建安郡齋所刻的「大戴禮記」，就是十三卷、四十篇本。中興書目所載，大概就是韓元吉刻本。日本靜嘉堂秘籍志所著錄的宋本，也就是這個韓本。明嘉靖年間吳郡袁竑據韓本加以覆刻，就是所謂嘉趣堂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這書兩部。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又據袁本加以影印。我們檢看四部叢刊本，始於第三十九，終於第八十一，中間闕去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從卷首的目次來看，第七十二是重複的；從內容來看，重複的不是第七十二，而是第七十四；

這就是韓元吉本的原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說「今本有兩七十二」，大概是據韓元吉本的目次而記載的；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說「重第七十四」，大概是就內容說的。元代至正年間海岱劉貞在嘉興路學宮，又刊刻了一個本子，清未費池劉氏玉海堂會據它影刻。我們拿玉海堂本和四部叢刊本對校，玉海堂本所重的是第七十三，而內容則與四部叢刊本全同。我們可以說，劉貞本也是出於韓元吉本，只是將重複的篇次加以改定而已。現在再看韓元吉本，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二這五卷沒有注解，其他八卷皆有北周盧辯的注；很顯然的，他是把有注的和沒有注的兩種殘本糅合成爲一本，所以篇數、卷數反較崇文總目所載的卷數相合；只是四十篇，反較史記索隱所說的三十八篇，多出兩篇，這又叫人起疑了。我以爲韓元吉本曾子制言分爲上中下三篇，可能史記索隱只作一篇算，所以韓本多出兩篇。但是唐人著述引用或提到大戴禮記的篇目，又往往不見於韓本，如孔穎達五經正義裏所引的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所引的諡法，唐六典也提到諡法，賈公彥儀禮疏提到的禘太廟禮等，在韓本都看不到，如果這些篇目都在隋、唐志所載的那十三卷、三十八篇以內，那麼，唐人所見到的殘本實與韓本不同，韓本多出的篇目還不止兩篇，這些多出的篇目又是從那裏來的呢？可能是由原有的篇章裏分出來的，即如許慎的五經異義引有大戴禮記盛德篇的一段文字，記明堂的制度，現在這段文字在明堂篇裏，可能明堂篇就是由盛德篇裏分出來的。其實，大戴禮記在隋、唐之際，已是若存若亡；孔穎達、虞世南、賈公彥等所看到的，未必同馬貞（作史記索隱的人）也看到，而幫助魏徵修隋書經籍志的人也未必看到，更不必是五代的劉昫（修舊唐書經籍志的人）或宋祁等（修新唐書藝文志的人）所看到的了；所以像王度記、辨名記……那些